游子思乡　落叶归根

——读《漂落异域的民族—17 至 18 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

鲁　波

由两位著名的卫拉特蒙古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马汝珩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大正研究员合著的《漂落异域的民族——17 至 18 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一书，最近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翻阅这部史料翔实、论述精当的著作，笔者心头不由得涌起一股暖流：这是我国卫拉特蒙古史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新成果，这部书也许标志着这一领域的研究从此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土尔扈特蒙古是我国蒙古部族中古老的成员之一，其先祖可远溯到 12 世纪下半叶克列特部的首领王罕，其后多经磨难，历尽艰辛，发展到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成为游牧于我国西北地区卫拉特蒙古重要成员之一。自 17 世纪初期起，该部牧民不断向西迁徙，大约到 1630 年左右，在和鄂尔勒克率领下，大部分牧民离开原来的牧地，经过哈萨克草原，越过乌拉尔河，到达伏尔加河下游牧放。在这里，和鄂尔勒克长子书库尔岱青建立了土尔扈特蒙古游牧封建汗国。阿玉奇执政时代，汗国统一，实力强大，控制了伏尔加河下游一带所有的卫拉特诸部的兀鲁思。1724 年，阿玉奇汗逝世后，土尔扈特汗国内部陷入动乱，沙皇俄国对汗国的控制也逐渐加强。18 世纪 60 年代，渥巴锡继承汗位后，民族危机加剧，于是，经过酝酿和准备，1771 年 1 月 4 日，他领导土尔扈特蒙古牧民发动反抗沙俄控制的武装起义，并于次日开始踏上重返祖国的征程，同年 7 月 16 日，胜利抵达伊犁河畔。土尔扈特蒙古人总计在伏尔加河流域居住一个半世纪，其间和祖国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并最终返回故土。《漂落异域的民族》一书，正是对土尔扈特蒙古人民游子思乡、落叶归根这一伟大历史过程作了生动具体的描述和准确科学的分析。

研究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和东归的历史，在国内，从清代乾隆朝中叶就已经开始，此后时起时伏，忽明忽灭，直到本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研究的内容，包括土尔扈特起源与王公系谱，土尔扈特与清政府关系，土尔扈特与俄国关系，土尔扈特历史人物，以及对土尔扈特蒙古社会历史的调查等方面。在国外，这一研究早在二百多年前也已开始，苏联（包括帝俄时期）、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日本的学者多所贡献。他们研究的内容，包括土尔扈特蒙古历史、经济、法律、文化、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等领域。在这些研究中，不乏得力之作，如帕拉斯用德文写成的《蒙古民族史料集》一书，大量利用了亲身调查的材料，对留居伏尔加河土尔扈特人的历史、法律、社会习俗作了详尽叙述，为人们了解 18 世纪土尔扈特民族提供了形象的资料。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国内外的有关研究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就国内研究而言，土尔扈特蒙古史上一些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阐述，长时间里没有一部完整的土尔扈特蒙古族西迁及东归的论著问世，就是这种不足的反映。就国外研究而论，一些著述不是在资料上完全忽略了汉文史料的重要价值而未加利用，从而导致在研究中完全歪曲了俄国与土尔扈特蒙古关系的实质，就是单纯限于对汉文史料的片断摘译，以及有关人

物和事件的考释，因而未能形成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特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汝珩和马大正两位学者总结吸取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并通过艰辛劳动和独立思考，出版了《漂落异域的民族》这一有价值的著作。这部书既是对迄今为止17至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历史研究课题的科学总结，也为这一课题未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因而有着重要意义。

马汝珩和马大正两位学者所以能完成这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绝非偶然，这是他们长期努力、艰苦劳动的结晶。当那场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学术文化的春天翩然而来之际，他们便踏进了被冷落多年的卫拉特蒙古史领域，辛勤耕耘，不畏劳苦。在国家发展、社会安定的良好条件下，两位学者共同发表了数十篇专题论文，1984年又合著出版了《厄鲁特蒙古史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漂落异域的民族》一书是他们继续耕耘卫拉特蒙古史学术园地中的又一收获。

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漂落异域的民族》一书的出版，将增进我们对土尔扈特民族为维护祖国统一与增强民族团结所作伟大贡献的认识。这部书不仅有其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弥补了清史研究的簿弱环节，而且对今天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也有其现实意义。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极其中肯，并不揣冒昧，就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略作阐述。

首先，在学术价值方面，《漂落异域的民族》一书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作出了贡献。

第一，该书是国内第一部对17至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历史进行系统而完整论述的专著，填补了我国学术界这一领域的空白。如前所述，我国研究土尔扈特蒙古历史如果从清代乾隆朝中叶算起，至今已有二百余年。其间，在清代，祁韵士著有《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皇朝藩部要略》、《西陲要略》等书，对土尔扈特部及其首领渥巴锡的历史与事迹、西迁后土尔扈特与清政府的交往关系，土尔扈特蒙古王公的世系等作了概略记述。七十一（椿园）所著《西域闻见录》，记述了土尔扈特西迁、东返的始末。魏源《圣武记》，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等书，也都概述了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和东归的经过，地理分布与历史沿革。作为史料和研究成果，这些书有重要意义。但是，它们都没有完整而系统地记述17至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的全部历史。就是在仅记述的内容中，在东归原因、人数、路线等问题上，或笼而统之，或诸多误谬，有许多不可取之处。民国时期，我国学术界对土尔扈特蒙古历史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除了《清史稿》有专篇记述外，就只有萧一山《清代通史》、曾向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等书偶有涉及，而且论点未能跳出清人的巢臼。至于张维华、王金绂、陈复光等人的论著，也多简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在一些沙俄侵华史、地方史和民族史专著中，开始列有章节论述17至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的历史。由于只是作为专史的附属内容兼而提及，因此，有关土尔扈特蒙古历史的情况远不充实，分析也未能展开。大量的专题论文，由于篇幅所限，也只能围绕我们前面提及的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未能由点到线，全面铺开。《漂落异域的民族》一书则不然，它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经过作者的独立思考和探讨，因而几乎囊括了17至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历史的全部内容。该书共分十一章，第一章导论介绍了基本史料和研究概况，以下各章分别论述了土尔扈特蒙古的历史发展及其西迁，为建立游牧封建汗国而斗争，阿玉奇汗执政时期的土尔扈特汗国，土尔扈特汗国与祖国的密切联系，土尔扈特汗国内部动乱与俄国对汗国控制的加强，敦罗布喇什执政与补充法规的颁布，民族危机的加剧与武装起义的酝酿，英勇悲壮的东归征程，安居故土的土尔扈特蒙古诸部，留居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的命运。这样，就把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历史既系统又全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书后附有大事记和土尔扈特蒙古王公世系表，更有助于读者对土尔扈特蒙古历史的了解。可以说，《漂落异域

的民族》一书是目前我国学术界有关卫拉特蒙古史研究领域内容最充实的著作之一。

第二，该书立论有据，分析精辟，论述透彻，对以往土尔扈特蒙古历史研究中许多错误多有匡正，是目前我国学术界这一领域的权威之作。众所周知，17 至 18 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历史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既有人物的活动，事件的发展，又有政治、法律、宗教等各种政策的实施，还有中俄关系等，内容纷繁，枝杈蔓延，难予梳理。本书作者不怕困难，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整理，实事求是，纠正了以往土尔扈特蒙古历史研究中许多舛误之处，颇令读者信服。例如，关于土尔扈特蒙古西迁的原因，过去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即认为土尔扈持蒙古的西迁，是出于蒙古族征服世界的扩张目的，是卫拉特各部首领们为实现卫拉特会议制定的、由卫拉特人去占领新的领土，以恢复成吉思汗的计划。历史事实是否如此呢？本书作者先是通过对有关论述的考察，指出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臆测。进而根据我国现存档案资料，进一步分析说明土尔扈特蒙古西迁既有经济原因，又有政治原因，这就是寻求新的牧地以摆脱因牧地紧张而造成的各部纷争，以及由于受到当时准噶尔部日益强大势力的威胁，由此而引起的卫拉特各部间的不和睦。最后，引用有关外文著作对上述论断作旁证。整个问题论述严密，结论无懈可击。又如，该书对土尔扈特蒙古东返祖国的性质、原因的分析出颇为精当。作者通过论述土尔扈特人民反抗俄国压迫的正义性，认为土尔扈特东归实质上是一次彻底的反抗俄国压迫的民族起义，是土尔扈特人民历次反抗俄国斗争发展的最高峰。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的主要原因，是不堪沙俄残酷压迫所致。这样，就纠正了在这些问题上以往中外著述中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把土尔扈特东归看成是“叛乱”和“逃亡”，认为宗教是东归的主要原因等等。

第三，该书使用资料非常丰富，特别注意使用大量的中俄文档案，并且在使用中注意鉴别真伪，从而使该书的立论有着坚实的基础。如众所知，有关 17 至 18 世纪土尔扈特蒙古历史的资料，既丰富多彩，又非常分散，包括档案文献，官修文书，当事人记述，少数民族文字史料，以及外文资料等。在这些资料中，往往珍珠和鱼目互见，禾苗与杂草并生。本书作者一方面努力搜集各种资料，书中引用的汉文书目、民族文字书目、外文书目将近百种，另一方面，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又不偏听偏信，而是进行综合性分析，认真对照比较，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档案文献为例，一般说来，档案文献是史学研究中的第一手资料，是当时历史事件较为真实的记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满文土尔扈特档，是清政府辑集形成的专档，集中收集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三月至三十七年(1772 年)十一月间有关土尔扈特蒙古返回祖国的详尽史料。此外，还有记述雍正九年(1731 年)出访土尔扈特蒙古的满泰使团政治活动的档案，为清代其他文书所不载，是研究清政府与土尔扈特蒙古关系的重要史料。本书作者在充分利用这些档案的同时，也看到了这些档案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撰写者的阶级偏见，有可能出现的种种失实与舛错之处，注意分析鉴别，使用其中真实可信的部分。

其次，在现实意义方面，《漂落异域的民族》一书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忱，因而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是作者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对读者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交往中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为中华民族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在交往融合过程中，表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这正是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能够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诸多原因之一。《漂落异域的民族》一书的作者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深深感到了根植于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的这种无形但又十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认识到这是维系我们伟大祖国统一的强有力的纽带，也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繁荣的巨大力量。正是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得本

书作者“历经十载，四易其稿”，并走访结识了土尔扈特这一英雄民族的后辈，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在该书的“献辞”中，作者写道：“通过土尔扈特英雄业绩的回顾，如果能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所阐发，并对今天我国民族团结有所补益的话，我们的心愿足矣。”读者可以想象，这是何等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感啊！以这种感情写出来的著作，又怎能不打动读者的心弦。

第二，是作者对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壮举的热情歌颂。作者在书中不仅探述了图理琛使团和满泰使团出使土尔扈特汗国及其历史意义，从而揭示了土尔扈特汗国与祖国的密切联系，对祖国的向心力，而且更满怀激情地讴歌了土尔扈特蒙古英勇悲壮的东归征程。阅读这部著作时，人们仿佛看到在狂暴的风雪中，令人难以忍受的冬夜里，土尔扈特蒙古人民怎样艰难地长途跋涉，击退沙俄军队的进攻，奔向祖国。土尔扈特蒙古人民这种不畏强暴的斗争意志与思念祖国故土的爱国热忱，通过本书作者的描述，形象逼真地表现出来，成为激励今天我国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祖国的可贵的精神遗产。

我们在肯定《漂落异域的民族》一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也应坦率地指出，该书并不是没有缺憾的。笔者认为，这种缺憾主要表现在对 17 至 18 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汗国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状况缺乏应有的描述，以至使得该书内容上出现缺漏。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材料分散，难于寻觅，可能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如果真能再下些功夫，有些材料还是可以搜寻到的，因为材料分散并不等于没有材料，例如，“1640 年蒙古卫拉特法典”中就有关于土尔扈特蒙古社会生活的材料。所以，从这一角度看，本书作者在探讨 17 至 18 世纪土尔扈特蒙古汗国的历史时，如椽之笔还应触及的更深更广一些。